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社会学分析

陶林涛*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一个重要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这一全新论断，到底该如何解释，学术界存在各种不同的认知。从社会学学科角度入手，本文通过功能主义、冲突论、互动论三种理论视角分析认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定义的转变具有必然性，是一次重大进步；社会进步（物质基础）、理念创新（政治基础）以及民众需要（阶级基础）、文化繁荣（文化基础）是促成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根源；明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转变，对我国社会发展具有特殊而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 社会学 功能主义 冲突论 互动论

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中提出一个全新的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该论断立刻引发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并迅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从党的十三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

* 陶林涛，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和社会发展。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到十九大“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诠释这两个论断的变化？本文尝试从社会学学科角度入手，通过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冲突论、互动论三种理论视角，对影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因素进行学理化探索和分析。

一 从功能主义的视角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

功能主义是社会学中最主流的理论视角，强调整体把控和分析社会问题，宏观色彩突出。

功能主义把社会看成是一个整体，认为社会有很强的自我整合能力，能够基于需求自动把社会各个部分按照功能整合成整体。社会矛盾的产生往往是社会结构失调、整合出错的产物，是社会部分功能失效的结果，通常与社会快速变迁或剧烈变革、社会整合出错、社会功效失调有关。功能主义认为，解决的方法一类是重新整合；一类是创新结构和功能。从功能主义角度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我们可通过以下问题进行思考：什么变化导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原有定义的社会主要矛盾出现哪些不适？新定义的社会主要矛盾与原定义的社会主要矛盾相比有哪些优势？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意义是什么？将面临什么问题？

从上述问题出发，笔者认为：

（一）生产发展、科技进步、执政理念的创新共同导致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变

1. 生产力快速发展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物质基础

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中国人民逐步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进而走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的物质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三十年前为解决温饱而定义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不适应现实，必须重新界定。

2. 科技飞速进步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客观条件

随着现代科技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一方面社会联系日益紧密，社会协作日益增加，另一方面社会不均衡、不充分发展带来的负面功能日益明显。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新时代，要实现国家民族的复兴，必须更好地利用科技创新、更好地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更好地平衡和协调各方面的发展。原来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

3. 党的执政理念与目标的变化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主观条件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肩负着国家民族复兴的重任。从全面小康到全面现代化，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西部大开发到乡村振兴，从生活富足到幸福美好生活等，这些新目标的实现要求党必须转变发展思路。因此，随着目标理念的变化，党工作的重心和主要任务也必然会发生变化，社会主要矛盾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

（二）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已无法解决新时代的社会问题

1. 旧矛盾无法解决新时代的现实难题

在新时期，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城乡矛盾尖锐、贫富差距拉大、环境问题突出等诸多问题不断涌现。这些问题都和原有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缺陷密切相关，而且单纯地靠发展生产、提升物质文化需要无法解决。面对发展红利越来越难以惠及整个社会；利益分配不合理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发展严重不协调等现象，“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几乎无法作为。因此，原来的社会主要矛盾被淘汰是不可避免的。

2. 旧矛盾无法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

当今社会，人民群众的需求开始日益高级化、多元化、个性化，从单纯的物质文化需求扩展为尊重需求、社交需求、环境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等多方面多层次需求。而且，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很多民众已经达到或者实现物质富裕，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是问题。他们期待更高层次的满足，更多样的选择，更个性化的服务。时代进步了，社会需求已经发生变

化，社会矛盾也必然发生变化。

3. 旧矛盾的负面功能在新时代尤为突出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基于当时社会发展极度落后的现实而提出来的。该矛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肯定是合理的，但是到了新时代，尤其是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严重社会问题的今天，该矛盾负面作用十分明显，必须提出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来取而代之。

(三)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更符合时代发展规律

1. 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更符合时代的特征

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发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吃饱穿暖到追求幸福生活，我国社会已经进入到全新的时代。我国将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下一步将逐渐实现全面富裕和民族复兴。人民群众的幸福、国家的富裕、民族的复兴等目标提出了更新更高的标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正切合时代的需要、人民的心声，是社会主要矛盾与时俱进的体现。

2. 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有利于实现美好生活

当今社会，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日益高级化、多元化、个性化，美好生活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富足，而是追求全面进步。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为民众追求幸福生活提供了可能。

3. 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有助于实现均衡充分发展

当前我国社会的问题大多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有关，而均衡充分发展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各部分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对于我国社会进步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四) 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是社会模式的全面转变，意义重大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必然带来社会焦点的变化。从关注“物质文化需

要”转变为关注“美好生活需要”，从着重改变“落后的生产”转变为着重改变“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种转变将改变经济优先的发展模式，改变效率优先的分配模式，改变物质第一的思维模式。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将为我国社会均衡发展、人民幸福生活、社会持续进步、国家民族复兴做出重大贡献。

（五）社会主要矛盾转变面临贯彻落实的难题

中国是一个大国，各种差异十分突出。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贫富群体之间一直长期存在显著差异，原因多种多样，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此外，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方政府、不同社会环境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认知也会不同。因此，社会主要矛盾虽然转变了，但是要真正贯彻落实并不容易。社会主要矛盾转变要落实成切实的行动，转化成具体的政策，转变成各级政府的工作中心，汇聚成为社会舆论的主基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不是短期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社会现实，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二 从冲突论的视角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

冲突论是社会学中较激进的理论视角，擅长透过现象看本质，发掘表象背后的内在逻辑和内在根源，比较适合中观分析。

在冲突论中，社会矛盾被看成是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是社会冲突、社会变迁的根源，往往和利益、权力、阶层（阶级）等方面密切相关。冲突论认为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利益分配不均、社会权力失衡的产物。需要从阶层（阶级）立场出发，从权力、利益角度解释社会矛盾^①。从冲突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冲突论流派的角度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我们可从以下问题思考：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根源是什么？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对社会结

^① 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11版），李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18～19、110～111页。

构影响如何? 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内在规律是什么?

从上述问题出发, 笔者认为:

(一) 社会利益分配不公、社会阶层流动受阻、社会权力异化(腐败) 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根源

1. 利益分配不公导致社会变革

经济利益是社会的核心问题, 一切人类社会活动归根结底是经济利益的反映, 我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大多和经济利益密切相关。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坚持市场经济政策, 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坚持经济优先发展, 在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 也带来了各种严重的分配不公。由于长期以来的分配制度存在明显缺陷, 再加上市场经济“马太效应”的催化作用, 我国社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在新时代, 利益分配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因此, 必须改变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模式。

2. 社会阶层流动受阻呼唤社会变革

社会学理论普遍从权力、地位、声望三个维度对社会群体进行阶层划分, 用阶层来描述社会群体的显著差异。一般认为, 社会阶层与财富、权力、地位、声望密切相关, 是后天的, 是可以改变的。一个社会越合理, 人们改变自己的阶层就越容易; 一个社会越不合理, 人们改变社会阶层就越困难, 尤其是向上流动。一般认为我国还没有到“阶层固化”阶段, 即社会阶层流动尤其是向上流动无法实现的情况, 但社会阶层流动越来越难也是不争的事实。随着资本日益强势, 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通道不断缩窄, 难度系数成倍增长。富豪王建林无意间的一句话“先定一个小目标, 挣它一个亿”迅速走红网络。“土豪”“富二代”“屌丝”等网络语言迅速走进日常生活。“艰苦奋斗十来年, 不如购买一套房”类似的社会现象不断涌现, 这些都说明社会阶层流动越来越难。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 拥有原始资本越多的人优势越发明显, 不少年轻人和无产者则在社会现实面前失去了梦想和勇气。要促进社会阶层合理流动必须进行变革。

3. 社会权力出现异化需要社会变革

权力是冲突论关注的核心问题, 一般认为权力是经济基础的反映, 是

经济占优势地位的群体为保护自身利益而做出的制度安排^①。因此，在权力结构中，经济强势群体往往是强权集团，经济弱势群体往往是无权集团。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国的权力结构和一般社会的权力结构有所不同。在很长时间内，我国经济弱势群体权力并不弱势。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模式的建立，经济强势群体优势日益明显。尤其是国家基于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强势群体进行大力扶持，我国的权力结构也开始改变。经济强势群体逐步成为权力强势群体，经济弱势群体权力日益衰落。随着滥用权力、腐败、以权谋私等行为不断出现，弱势群体愈加弱势，利益受损日益严重，而富裕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力则不断提升，贫富群体之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普通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对政府权力异化（腐败）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遏制当前社会权力异化问题已经成为新时期政府施政的重点。

4.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对社会利益、社会阶层、社会权力等方面问题的回应

在新的历史时期，解决我国的社会利益分配不公、社会阶层流动受阻、社会权力异化（腐败）等问题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上台以来的全面反腐、从严治党、精准扶贫、供给侧改革等一系列政策都着眼于此。“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极具针对性。要改变当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必须调整利益分配模式，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保证政府权力的合理运用。要实现“美好生活”，也必须改善利益分配格局，促进社会阶层流动，遏制腐败。因此，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有的放矢的。

（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将促进社会分配的公正化、社会阶层流动合理化，有利于增进民众幸福

1. 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将促进社会均衡发展

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强调“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因此政府必将出台大量的政策和措施来改变当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格局。农村地区、

^① 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11版），第18~19、110~111页。

西部地区、广大弱势群体作为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受害者将会得到重点帮扶。以前被忽略的生态建设、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等也将加快建设步伐，成为工作的重要环节。我国也将逐步实现平衡充分发展。

2. 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将促进公正分配和合理流动

随着“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的逐步解决，分配不公将得到极大的改善，分配制度将日益公平公正。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贫富群体之间的资源流动将在政策的支持下不断加速，而各种资源的快速流动必然会带来社会阶层流动的加速，会使得阶层流动日益合理。因此，社会必将出现分配格局公正化、流动格局合理化的大好局面。

3. 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有利于提升民众生活质量

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强调“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实现美好生活，必须对民众的需求进行合理规划：保障基本需求，满足合理需求，扩展发展性需求，遏制不合理需求。对于基本需求，将一视同仁，做到人人享有，生活无忧；对于合理需求，要因地制宜，尽量满足民众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还要大力提升民众的发展性需求，让民众生活方式更加多彩，生活品质更高雅，生活感受更幸福；对于不合理需求，应该坚决打击和遏制，尤其是不良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位，要坚决批判和抵制，为民众美好生活助力。

(三) 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将使社会主体中产化、社会权力法治化，有利于社会长治久安

1. 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将带来社会阶层中产化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贫富群体之间的差距也将不断缩小，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将跻身中产行列，人民的收入将逐步均等化，社会也将中产化，即中产阶级将成为社会的绝对主体。与此同时，对富裕群体进行适当的限制也将成为必然趋势，这将进一步提高中产阶级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地位。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样的社会结构最稳定，也最合理，也符合我国共同富裕的初衷。

2. 社会阶层中产化将使得社会权力法治化

随着社会阶层中产化，社会差异将得到合理遏制，民众的社会认同和

社会满意度将不断提升。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的绝对主体，其权力在民主社会中不断得到强化，话语权和决策权将不断提升。而要维护稳定的局面，合理调节不同阶层的利益、合理制约社会权力，必须依靠法治。因此，社会权力的法治化将是必然趋势。

3. 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将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利益分配会更公平，民众将更幸福，社会将更和谐；阶层更合理、社会更稳定、社会更包容；权力更法治、社会更现代、决策更科学。这一切都将促进社会的长治久安。

（四）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都已具备

1. 社会“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经济基础

新时代，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物质匮乏，而是经济发展惠及的地区、人群、行业等存在严重偏差，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经济问题是经济基础的直接体现，经济问题的变化预示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在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不充分的今天，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已经具备经济基础。而且，国家要重点照顾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弱势群体；要放弃利益导向机制，强调公平优先；要强调五位一体全面进步等政策的实行依赖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

2. 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诉求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社会基础

新时代，人民群众的需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最初的吃饱穿暖到生活富裕，从生活有盼头到生活更幸福，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人民群众对生活的需求正在不断提升。美好生活需要是偏精神性的需求，是在物质需求基本满足条件下的更高追求，是在生活水平达到较高程度的国家中人民才有的需求。而我国社会长期高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得美好生活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近，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现实的需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① 追求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已经成为新时代社会各界的共同心声，亟须政府给予回应。因此“美好生活需要”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社会基础。

3.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政治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新时期，底层民众对贫富差距、地区差异强烈不满，普通民众对于阶层流动、利益分配格局提出质疑，富裕阶层对社会环境恶化、权力结构固化诸多抱怨。不同群体，利益不同，关注点不同，诉求也不同，但他们的诉求都应该得到回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就是党对人民群众诉求的回应，也是中国共产党责任和使命的体现。在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党的领导下，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政治基础已经具备。

4. 思想文化大繁荣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文化基础

新时代，中国社会已经呈现思想日趋多元、文化日益繁荣的良好局面。不同阶层需求都有表达的渠道，不同群体才华都有展示的空间，不同人群的个性都有张扬的机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很显然，思想文化大繁荣为满足不同群体的社会需求提供了有利的社会舆论环境，也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奠定了文化基础。

三 从互动论角度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

互动论是社会学中的微观理论视角，擅长从微观互动中寻找社会运作的普遍规律。

从互动论来看，社会最核心的是社会共识，社会能够进行各种互动依赖于各类社会共识，一旦社会共识被打破、被颠覆，或者社会共识的传承出现问题，人们的普遍认知就会混乱，就容易互动不畅，导致社会矛盾。因此，要解决社会矛盾，要么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维护原有的社会共识，惩罚破坏共识的个人或者组织；要么抛弃旧共识，建立新共识^②。用互动

① 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http://www.ccdi.gov.cn/special/19da/lcddh_19da/18da_19da/201710/t20171013_108981.html，2017年12月20日。

② 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11版），第19~20、115~138页。

论来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我们可以思考以下问题：什么因素破坏了社会共识、社会为什么不阻止这种破坏行动？新旧共识哪种更符合社会发展趋势？新社会共识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强化社会共识的措施有哪些？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分析，笔者认为：

（一）原来的社会主要矛盾无力迎接新时代的挑战是社会矛盾转变的根源

新时代，传统发展模式的缺陷不断暴露，发展的成果越来越难惠及普通群体，该共识开始面临挑战。“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东部像发达国家，西部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达惊人的地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存在严重悖论”……民间、学术界的质疑在新时代不断涌现，使得原来的共识受到挑战。面对质疑，政府没有选择故步自封，而是与时俱进、大胆创新。“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相继提出，“生态文明”备受重视，这些都从根本上动摇了旧的社会共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提法已经难以为继，终于在党的十九大上被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取代。

（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对原有发展模式的改进和创新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取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科学发展观”的延续，是一种进步和创新。2003年，“科学发展观”诞生，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传统以经济效益（GDP）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开始遭受全面挑战。经过十几年的激烈交锋，新模式逐渐占据上风，逐渐成为社会的新共识。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习近平总书记大胆创新，提出了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美好生活需要”的提法更切合人民群众的希望，更容易获得民众的认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社会现实问题更加切合，更容易引起民众的共鸣；长期片面发展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更是让民众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带来的变化充满期待。

(三) 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将受传统思维掣肘、受既得利益集团阻挠，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是场持久战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带来了社会共识的变化，而社会共识的转变往往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社会共识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具有极强的相对独立性，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旧的社会共识虽然被打击、批判，被党和国家抛弃，但是其存在的土壤不会立刻消失，社会中的既得利益群体并不会轻易放弃，定会极力阻挠。经济发展重要还是环境保护重要，效率优先合理还是公平优先合理，加快城镇化要紧还是振兴乡村要紧，维护资本权益重要还是保障员工权益重要等一系列问题依然会争议不断。效率和公平、经济和非经济、城市和农村、弱势群体和富裕阶层等方面的关系如何处理依然很难解答。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在各地存在巨大差异的背景下，在思想日趋多元的今天，达成新的社会共识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任务。

(四) 新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

1. 必须改变传统功利的发展理念

要想改变“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况，必须重点扶持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弱势群体，注重科学发展。由于先天条件限制，落后地区发展的速度不会快，建设的成效也不显著，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因此，不能指望快速成功或短期出成果，必须立足长远，立足未来，本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想法去建设。

2. 必须树立质量优先的发展理念

我国在很长时间内都过于着迷发展速度，不太注重发展质量。要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必须抛弃过去那种速度第一的发展理念，树立质量第一的发展理念。

3. 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导向机制

科学合理的导向机制对社会共识的建立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从权力角度来看，国家要把均衡发展和美好生活当成政绩评价的核心指标，各级地方政府必须严格执行。从社会舆论来看，社交媒体应该发挥积极的舆论导

向作用，宣扬正能量，宣扬主流价值，宣扬促进社会进步的思想，坚决抵制错误思想。

4. 积极引导民众参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强调“群众路线”。民众的认可将提高政府施政的效率，民众的实践能提供各种现实经验，民众的创新将发挥决定性作用，民众的幸福程度也将成为评价尺度。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离不开人民群众。

5. 建立合理的惩戒机制

在社会的实践中，一定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行为。政府必须有明确的制度安排来约束各种违规行为。对于社会上的各种声音应该科学分析，合理应对。人民内部矛盾当然是批判教育，敌我矛盾必须坚决回击。

四 三种理论视角分析获得的共同结论

功能、冲突、互动是社会学中最主流的三种理论视角，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做出系统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共同的结论：

(1)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具有历史必然性，是一种进步和创新。

(2)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的提出是基于发展的需要、现实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优于原定义的社会主要矛盾。

(3) 社会进步（物质基础）、理念创新（政治基础）、民众需要（社会基础）、文化繁荣（文化基础）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4)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并不容易，需要制度保障，需要长期奋斗。

(5)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将对我国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改变我国社会格局。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一论断是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一次大胆创新，对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戴维·波普诺 《社会学》(第11版)，李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何敬文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不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与理论界的三次思想互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

张占斌 《正确认识中国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人民论坛》2017年第11期。

李忠杰 《全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界定》，《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年第11期。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Chinese Society

Tao Lintao

Abstract: In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Secretary General Xi Jinping has made an important statement in the report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Chinese society has evolved into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and the people’s ever-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On how to interpret this new statement, cognition varies in academia. From th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f functionalism, conflict theory and interactive theory, a conclusion can be mad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our society is an inevitable trend and a great step forward. Social progress (as material basis), concept innovation (as political basis), people’s needs (as class basis),

cultural prosperity (as cultural basis) are the main force to propel the 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 to evolve. It has a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our social development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Chinese society today.

Keywords: 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 Sociology; Functionalism; Conflict Theory; Interactive Theory